

难忘抗美援朝的日日夜夜(上)

□ 马清文

朝鲜战争爆发后,接北京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命令,我所在的平原省警三团和警二团合并到66军196师,准备入朝作战。1950年10月22日,当夜,我们从天津市出发,坐火车到达丹东市。10月25日,当敌进至鸭绿江边时,中朝军队即发起第一次战役。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命令我团所在的66军196师急速跨过鸭绿江,进至朝鲜境内的龟城,阻击美军第24师及英军27旅。接到命令后,我们团迅速投入战斗,连夜袭击英军27旅。我们翻过一座山头,敌人的炮弹连续打来,我趴在一个土坑里,躲过敌人的炮弹。当夜,我们马副团长带着三连赵志学、副连长陈德山,连夜袭击了敌人在河边的帐篷,消灭敌人32名,缴获5支卡宾枪。这次战斗,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涌现出了与敌人拼刺刀的战斗英雄刘桃顺,他的英勇事迹在全军进行通报表扬。

志愿军在云山以北地区和温井西北地区首歼南朝鲜军第六师一部,并向温井、熙川等地区展开攻击。11月3日,“联合国军”被迫开始全线撤退,志愿军乘胜追击,11月5日,敌撤至清川江以南暂时转入防御,第一次战役结束。此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局极端严重情况下,急速入朝投入交战。中朝人民军队英勇奋战13昼夜,共歼灭“联合国军”1.5万余人,粉碎了敌人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并将其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获得初战胜利。从而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获得了对美作战的初步经验,为以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天夜里,我们团克服重重困难,渡过了结满冰块的清川江。我们团侦察参谋薛成同志不幸踏上了敌人的地雷,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我和参谋路有道行军到清川江对岸的一座小房子时,天还没有亮,敌人就开始疯狂地对这座房子进行扫射,我们迅速撤离,进入树林中。当时,敌人为了保存实力,按照美军将军麦克阿瑟的命令,发现我军主力赶快撤退。我军发现敌人后,迅速出击,一直追到泰川安心洞村。敌人在两处山上构筑工事,阻击我们前进。我们在玉米棚下,抓住两个敌人。被敌人发现后,我们团三个营迅速出击,就在这个山沟里,与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我们的战士具有

丰富的作战经验,战士们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充分发挥火力优势。拿着炸药包、手雷、爆破筒三个武器,向敌人的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夺取6个山头,消灭了大量敌人。这一次遭遇战,我们587团打出了军威,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虽然伤亡267人,但我们取得了战胜敌人的成功经验,掌握了美国鬼子最怕夜战、近战弱点。第二天早晨,我们团长、政委下令在树林里生火做饭,战士们吃过早饭后,踏着冰天雪地,向朝鲜“三八线”进军。

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部队的后勤供应难以保障。经过连续行军,战士们饥寒交迫,在冰天雪地上顽强前进。经部队首长同意,战士们向朝鲜老乡借来了两口袋玉米,煮一煮用来充饥。因玉米豆没有煮熟,战士们在行军路上拉起肚子。我们的指导员冀子章、连长武先堂每人背3支枪,鼓励战士们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天刚亮,我们还要上山,在树林里隐蔽,防止敌人飞机的轰炸。这种战争的艰难程度,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我们这一支人民的军队,是由毛泽东同志培养出来的英雄军队,什么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1950年12月31日,我们部队历经艰辛,终于到达突破“三八线”的前沿阵地——龙沼洞村。

按照第三次战役的部署,第66军主力的任务是分别从龙沼洞及马坪里、同坪里地段突破,向济宁里方向进攻,会同第42军歼灭南朝鲜军第2师。我们587团奉命在国望峰及523高地以西、673.6高地以北,约三公里的正面突破。第一步攻克龙沼洞、鸟舞洞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之敌;第二步向官厅里方向进攻,与左邻第588团、第586团围歼该地南朝鲜军第2师第32团团部、炮兵群及其以北地区之敌。

战斗开始前,我们团长李英奎、政委温藏宝、副团长吕瑞亭、副政委何建奎、参谋长张茂生等同志开会研究由哪个营担任主攻问题。一营营长赵福生、教导员王东方与二营营长贾恩高争着当尖刀营,互不相让。后来,温政委说:“还是由一营担任尖刀营吧。”吕瑞亭副团长对我说:“马

清文同志,你爱写新闻稿子,跟着尖刀营,可以看到战士的进攻动作。”我说:“好!”当夜,我们采取夜摸手段,穿过了敌人的铁丝网。侦察排长李振国同志在冰天雪地里抓到敌人两个哨兵,用麻袋抬了回来,经审问弄清楚了敌人在龙沼洞一线的兵力部署情况。

根据敌守军兵力分散、工事不坚、疏于警戒,且纵深地形隐蔽等情况,我们587团以第1、第2营为第一梯队,第3营为第二梯队,于12月31日上午,向“三八线”方向运动,占领有利地形。12月31日19时,我团未经炮火准备,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当天20时,第2营占领国望峰。第1营突破了龙沼洞阵地,占领了523高地。20时25分,523高地守敌全部被击溃,第587团直插敌人的纵深地带。23时30分占领龙沼洞地区,敌大部溃退至加林南山。1951年1月1日3时,第587团攻克龙沼洞、鸟舞洞,完成第一步任务。6时许,第587团继续向加林西北高地和748.7高地以西进攻,歼敌100余人。之后,迅速向官厅里进攻。16时,占领官厅里南北地区阵地,完成第二步任务。19时,石龙山方向南朝鲜军第32团第1营及第3营残部400余人,由东北方向南撤至官厅里。第587团以第2、第3营展开攻击,毙伤俘敌140余人。24时,第587团进至修德山、中洞村和478.7高地地区,截断南朝鲜军第2师撤往济宁里的退路,完成第三步任务。1月2日,南朝鲜军第2师第31团900余人南逃,先后退到中洞村,第587团以伏击和截击的战法,将其击溃,俘200余人。3日搜山,又俘敌200余人。此次东线作战,第587团消灭敌人1300多人,缴获大炮6门,卡宾枪和轻重机枪350支,圆满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

在战斗过程中,由于我军和敌人交织在一起,美军的飞机也无法轰炸。我们乘胜追击,追到上下红积里。战士们太渴了,我叫通讯员马上熬一锅稀饭喝,水还没烧开,敌人200多人从山沟里冲出来,想夺路逃跑。我们在雪地上披着白单子,又抓住100多名俘虏。我让一名俘虏,站在台子上向敌人喊话:“志愿军优待俘虏,只要交枪绝对不杀。”一会儿,敌人又有100多人缴枪投降。当天下午,我们开展了搜山战斗,马副团长被敌人的卡宾枪打中腰部,被警

卫员背下山来,子弹取出后,进行了简单包扎,又继续指挥战斗。我们197师的战斗英雄、副营长王有根,浙江杭州人。1951年1月在第三次战役华岳里战斗中,他带领一个连插入敌军纵深,割裂敌军防御体系,歼敌4个连,缴获榴弹炮12门,荣立一等功,受到志愿军总部的表彰。回国后,王有根曾到清华大学作先进事迹报告,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这次三八线战役中,我66军3个师和46军2个师参加了战斗,共歼敌35000多人。这次战役,我部首先突破“三八线”,攻占华岳山,瓦解了敌人的中线防御体系。战斗结束后,我们可爱的志愿军战士们和李团长、温政委,站在三八线的冰天雪地上,化雪为酒,向着北京方向,祝贺毛主席身体健康,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强大。

当夜,我们又奉命进行了四次战斗。在一个着火的村子里,我们二营六连隐蔽在树林中,一个炊事员送饭,被敌人一个炮兵校正机发现了,连续打了一阵炮弹,牺牲了3名战士。贾营长发了脾气说道,没打仗就死了3个人,太可惜了。我们在穿插路上俘获南朝鲜的一辆汽车,释放了汽车上的妇女和小孩。我们团2700人穿插到一个周围都是山,中间为平地的一块山地里,准备与美国侵略军打一场所仗。我到三个营区检查防御工事后,刚回到司令部,就发现了我们太行独七旅的电台台长白冬艾。他奉北京军区命令,带着一部电台跟着我们587团穿插来了。我说:“老白,你也来了。我们解放战争在一块,如今朝鲜战争又在一起了”,我俩紧紧地拥在一起。后来,我们66军奉命回国,我军的电台和通讯人员一律交给26军,又打了5次战役。在谷山山顶上,我和白冬艾握手告别,我给他一块香皂,他不要。他说:“如果我牺牲在朝鲜,你给我妈写封信,就说我为保卫祖国牺牲在朝鲜了。”他在5次战役中,没有粮食吃,就挖野菜充饥,一连吃了5-6天。他在26军无线电任连长,授上尉军衔,后来转业到云南景东林业局,当办公室主任,不久因病在云南昆明去世。横城阻击战,66军以196.197师向横城东南方向突击,并参加横城反击战防御任务,毙伤俘敌5062名。

活捉匪首王景全

临汝县解放前,匪霸王景全在临汝县境内可谓无人不晓,名声很坏。

王景全幼年时家庭贫寒,他经常衣着破烂,头上长着黄水疮,两鼻孔滴滴溜到下巴上,看着让人恶心讨厌,人送外号“烂倭瓜”。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却青云直上,成为骑在群众身上拉屎拉尿的恶霸,这还要从他的大哥王景元说起。因为家穷,王景全的大哥王景元年轻时投靠镇嵩军,先后被提升为排、连、营长,最后做了团长。后来王景元脱离军队,回到临汝,借着战乱年代,王景元又先后任临汝县城防司令,临汝、鲁山、郟县、宝丰、伊阳五县联防主任,国民党临汝县财委会主任,河南省参议员等职。王景元还与国民党许昌专员吴协堂、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国民党十五师师长武廷麟等上层人物私交甚好。有了这些资本,王景元巧取豪夺,成为临汝县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凭着大哥王景元的财产势力,王景全也豪横起来。他买枪、抢枪、招兵买马拉起土匪武装,自称“王团”,在临汝县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行凶作恶。这时,别人再也不叫他“烂倭瓜”,而改称他为“三大人”。有一回,国民党一师师长万殿尊向嵩县老家田湖镇运送50支枪支和财物共30车,途中走到观上村一个村,王景全闻讯,率人将其劫夺。万殿尊自然不肯罢休,追查劫夺土匪。王景全的大哥王景元赶紧出面说和,最后以赔偿万家银两了结此事。而赔偿的银两却按了银摊到当地老百姓身上,王景全劫枪的枪支、财物全归自己所得了。

最可恨的是,1944年夏,日本人侵占了临汝,日伪县政府委任王景全为自卫团团长,王景全卖身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做了汉奸团长后,王景全多次攻打大略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焦道生部队。一次,八路军“皮徐支队”委派统战工作的张清杰同志到观上劝说王景元抗日。王景元没有答应,张清杰走后,王景全就率人到汝河岸边的下水磨村,抄了给张清杰带路的李逢家。日本投降后,王景全回到老家观上村,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可以随心

所欲的打死任何人,他的闺女嫁给一户姓李的人家,后因病而死,王景全恼羞成怒,诬蔑李家虐待了他的闺女,派人到李家又砸又打,还强迫其女婿给他闺女披麻戴孝。

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临汝的唐沟村与国民党青年军激战,王景全闻讯,调集土匪数百人,在观上村的西大岭上设防,准备一旦解放军路过,即开枪抵抗。结果,当解放军一部从此路过时,王景全骑马在阵地上耀武扬威,指挥土匪抗击,谁知刚一接触,他指挥的土匪武装就五零八散,各自奔逃而去,王景全骑的马也被打伤,几个护兵架着他逃离阵地,返回老巢。

解放军并没有给王景全机会,不久就包围了观上村。王景全组织土匪上寨墙上顽抗,还没有守够20分钟,解放军就攻进村子,土匪们有的弃枪投降,有的跳墙仓皇逃命。王景全见大势已去,慌乱中扮作一个外科郎中,混入百姓群里,从南寨门溜出。

王景全从前学过一些外科手术技艺,因此才假扮个外科郎中,企图蒙混过关。谁知竟为此被人识破捉住。却说王景全乔装郎中,逃到一个叫对确沟的小山村里,隐藏起来。次日早上,王景全获知解放军还在观上村,正在四处搜捕他。王景全不敢久停,准备走山路进临汝县城,去寻他的大哥王景元。他带着几个残匪走到天黑,眼看夕阳落下西山,几个残匪走得腰酸腿困,便提出找个地方住下歇歇脚再走。王景全自己也走得疲乏不堪,也想歇一歇身,就吩咐一个小土匪说:“去问问,这里的山叫啥名!”

一会儿,小土匪回来说:“这儿的山叫砍头山。”王景全一听,骂道:“他妈的,砍头山,太难听啦!不准在这儿停,快走,再找个吉利点的地方。”

一伙土匪又走了几里地,也没找到合适的歇脚地。有个小土匪说:“这儿有座庙,叫祭爷庙,咱不如在这住下。”王景全听说是祭爷庙,说:“中,咱就去祭爷庙,当一回爷。”可是真的找到那座残破的小庙,还未坐下,王景全又觉得不对劲,说:“祭爷庙,虽说是爷,可是让人祭拜的,谁会祭人啊,不中,咱还得再走。”小土匪们已经都走不动了,听王景全这么一说,也不敢犟,只好打起精神又走了。又走了两三里路,看见一个小村。一个

小土匪突然来了精神,对王景全说:“这个村叫堡洼西庄,我有一个亲戚,住在这儿,不中咱就住这儿算啦,眼看快半夜了。”

王景全也折腾得再也迈不动腿了,对那小土匪说:“不能住你的亲戚家,解放军的人鼻子灵,一旦知道你的亲戚在这儿,摸过来就糟了。你去问问,这村里谁家宅子深,院子后有山,有事走着方便,咱就去谁家。”那小土匪说:“这不用问,我对这儿熟悉,往村中走不远,有一家姓梁的,家里院子深,后院门临着一条山沟,咱们去住正合适。”

王景全点头答应,带着土匪们摸进了那姓梁的院子。梁姓家的男主人见半夜有人闯入,仔细一看认出是王景全来了,心中不快,但也不敢阻挡,就把他们安排住进了西厢房。王景全一伙落脚刚定,那梁姓男主人推门把他的一个护兵叫出去了。两个人在院子里嘀咕了一阵,护兵又进屋了,王景全警觉地问:“他叫你出去说啥哩?”那护兵犹豫着说:“他说,村西头住了七八个解放军,天黑时就来了,这会儿正睡得香呢。那人说,怕出岔子,来给咱说一下。但他说也不会出事,咱们来得晚,和他们住的地方隔得也远,估计他们也不知道。”

王景全听着,琢磨会儿说:“现在深更半夜,再也没地方住了。这样,没事便罢,真要有事,就说我是鲁山那边过来的李先生,治跌打损伤的。明儿早起就走。”

王景全做梦也没想到,住在村里的那一队解放军到后半夜时,有一个战士肚子疼,直疼得滚上滚下的,带队的班长就问屋主人,村里有没有郎中。屋主人说:“村里没有郎中,不能治咱的病不。”那班长也是病急乱投医,说:既是郎中,麻烦你去把他叫来。

那屋主人来请时,王景全不敢不去,就带上早已备好的治病工具,来到解放军住的地方。他给那个患病的战士扎了几针,不料效果还不错,针拔掉后,那战士的肚子就不疼了。王景全也不敢多停,慌忙走了。

王景全走后,那屋主人吞吞吐吐地对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说:“刚才那个李先生,俺看着像一个人。”解放军班长问:“你认识他?”屋主人说:“他看着有点儿像王景全。”解放军班长一下子精神起来,追问道:“你见过王景全?”屋主人说:“过去见过一两回,认得不

准,不过真有点像王景全。”

解放军班长高兴地说:“我们到这儿的任务就是搜捕王景全的,真要是他,你可为咱立了大功啦!”说罢,急忙集合战士们,悄悄包围了那姓梁家的院子。

王景全回到家,心神不定。正在这时,忽然听见院门外一阵高喊:“王景全,你已被包围,赶快缴枪,饶你条活命。”语音未落,一阵枪声在夜空响起。

外边这么一响枪,追随王景全的几个土匪慌了神,窜出了屋子,刚一出屋,有两个土匪就被打翻在地死了。另外几个土匪翻墙外逃,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人按翻活捉了。王景全躲在西厢屋,不知所措。突然屋门被人打开,几个战士拥而进,用枪对准他的头,喝道:“王景全,你被捕了。”王景全此刻假装无辜说:“我不是王景全,我是鲁山的,姓李,来临汝走村治病人的。”

几个战士说:“那好,李先生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王景全是那个著名的土匪,附近村子的老百姓几乎都认识他,因此一出门就露了馅。解放军把王景全押到燕子河岸边的滕店村,秘密关押,秘密审讯,想让他提供点大土匪王景元的情报,也想逼他要藏匿的枪支。但王景全对王景元的情况闭口不谈,却谎称他在观上老家的山坡上埋了一批枪支,愿意献出来,让解放军饶他不死。

解放军派了20多个战士,趁夜晚把王景全押着,到观上村起枪,结果在野外的坡岭上转了半夜,也没有找到半根枪。战士们愤怒极了,知道王景全在耍弄他们,便把他押着往回赶。

王景全此时心里还在打着小算盘。他想在野外拖时间,万一他大哥得知他被活捉的消息,肯定会派人来救他。他在野外,被救的可能性就大。因此走到滕店村一个叫东坪的地方,王景全见再走就仍然会被关起来,便躺在地上死活不走了。

战士们见状,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一阵刺刀将他戳死了。

王景全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凝

·连载·



(上接第2940期)

后来,真正把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还真是多亏了习总书记亲自从北京帮我们找人,为产品打开了销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帮你们打开销路的?

张新立:习总书记帮我给北京的文艺家活动中心一位同志打了电话,并且跟他打好了招呼,让他接待我。之后,他就安排我去北京。临行前,习

书记嘱咐我说:“新立,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这次去北京找的那个人,他跟文艺界的联系非常多。关键是,他和一些单位的舞台灯光设计人员很熟悉。通过他,可以把你们厂的产品推出去。”

我到北京以后,很顺利地联系上了那位同志。他在文艺家活动中心组织了一个“彩色灯光声控研讨会”。当时,他把很多单位的灯光舞美师都请去了,我就在这个研讨会上给这些单位演示我们的产品,效果非常好。而且,那一年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建国35周年大庆就要到了,我们这个灯光设备对增强演出效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参加研讨会的单位,很多都订了我们这个产品。

那一年,在建国35周年大庆的很多舞台上,我们的产品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人们议论说:“正定县的几个农民,在舞台灯光控制方面搞出了这么重大的发明,在国内首家推出这样的设备,真是了不起啊。”后来,为了鼓励我,习总书记还亲自给我颁发了一个自学成才奖。

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怀疑和不理解。比如有两个北京的单位知道这个产品以后,打算采购,拿了产品说明书之后,就派人到我们厂来调研,他们看了我们简陋的厂房,觉得我们这种条件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然后,他们又到深圳、上海转了一大圈,哪里都没有和我们类似的产品,后来还是回到正定,在我们厂采购。厂房看着简陋,但我们确实是国内第一个研制和生产声控灯光技术的厂家,从产品的电路、结构、外形到说明书全部出自我们自己的手。

当时我们的硬件、营销等方面根本没有实力,就是有这么一个产品。说实话,也多亏了习总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帮助我们,我们的产品才能推向市场、发挥作用,工厂也得到了发展。

采访组:请问您是哪一年转为干部的?后来在岗位上又和习近平同志有什么交集?

张新立:1985年,我因为办厂的一些贡献和取得的一些成绩,转成了国家干部,到正定县科协工作。同时,我和陆树棠还一起办了一个业务员培训班。办这个培训班的初衷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干部和群众对商品经济的知识还比较贫乏,培训班主要是帮助大家学习一些常识。后来,我们把培训课程汇编成了一套工具书,不是长篇大论地讲理论,而是搞成了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业务员培训手册。

为了增加教材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就和习总书记说:“能不能请于光远先生写个序?”习总书记说:“你们先给于光远的秘书打个电话,把书稿提供给他们。”我们没有联系上于光远先生。后来,习总书记又想办法再次帮助我们联系。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写序的事情没有办成。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厦门工作。临行前,您去送他了吗?

张新立:是的。1985年,习总书记调到福建厦门工作。他走的那天早上,我到县委去,一敲他办公室的门,张银耀把门打开了一个小缝,对我说:“习总书记正在吃饭,等一会儿吧。”我刚要离开,正在吃饭的习总书记一抬头,从门缝里看到了我,就说:“新立,进来,进来!”

我进了屋,习总书记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天,说了一会儿话。几分钟以后,习总书记吃完饭了,县里领导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也都来送他了。大家帮他提装书的箱子搬上车,跟他告别。

1987年,我去厦门找过他一次。头两天,习总书记去调研,我就在住处等他,到了第三天,习总书记回来了,抽出时间来见我。我跟他汇报了一下这两年工作的情况,又和他拉了拉家常。之后,我又在厦门待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习总书记自己出钱给我买了机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非常兴奋。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张机票是210块钱。

习总书记后来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我后来调到电子元件厂工作,李亚平是厂长,我是副厂长。那期间,李亚平到福州去看望习总书记。习总书记跟李亚平说:“你捎个信给张新立,请于光远先生给他编的书写序的那件事,后来一直也没办好,我感到很抱歉。”

听到李亚平带来的这句话,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习总书记不提,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这本就是一件小事,只能是随缘,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也很正常。但习总书记把我这个民间朋友的承诺看得如此之重,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一直记在心里,念念不忘!这是让我最感动的。(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会转的桌子

一人富人和一个穷人结成了朋友。富人请穷人吃饭,穷人嫌桌子低,不方便。富人手一挥,命仆人拿来四个金元宝,把桌子垫高了。穷人感叹还是人家有钱啊,垫桌子都用金元宝!

轮到穷人请富人吃饭了,富人也嫌桌子低,不方便。穷人一吆喝,让他的四个儿子趴下,一个支一个桌子腿,把桌子垫高了,吃喝了一会儿,他又命令四个儿子:孩子们,转一转,让你伯父大人倒桌方便!

这时,富人感叹:还是有人好啊,钱再多,不会转,有人才会转啊!

讲述者:陈信义
整理者:陈凝

民间故事

讲好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